

特罗耶波尔斯基  
短篇小說選



# 特罗耶波尔斯基 短篇小說選

王家驥等譯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七年·北京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東 四 頭 樓 胡 同 4 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登記證出字第 057 號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發行

\*

書號708 字數129,000 開本787×1092 紫<sup>1</sup>/32 印張7<sup>3</sup>/8 插頁2

1957年7月北京第1版 1957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制

印數 00001—13000 冊

定價(6) 3.60 元

## 本書出版說明

加夫里爾·尼古拉耶維奇·特羅耶波爾斯基（Гавриил Николаевич Троепольский）是苏联現代短篇小說作家；一九〇五年，他生於沃龙涅什省諾夫斯巴斯克村，一九二四年，在一所農業学校畢業后，便担任了教学工作。五年后，他改行作了农艺师，此后，二十余年以来，他一直在农村工作。

特羅耶波爾斯基早在一九三七年就开始了文学活动，第一篇作品“爷爷”刊載在“沃龙涅什文学作品集”上。随后，在一个相当長的时期內，他沒有發表什么，直到一九四八年，他才重新开始写作。一九五三年，作者在“新世界”雜誌上發表了包括五个短篇的“一个农艺师的札記”，立即引起苏联广大讀者的注意，接着，他又連續發表了一些描写农村生活的短篇小說，都获得了肯定的評价。

收集在这本書中的六个短篇小說，是作者較优秀的作品，其中“米特里奇”一篇在苏联贏得了普遍的好評，这

里是根据一九五五年第十期“新世界”杂志译出的，“在悬崖边上”和“农艺师”两篇是根据一九五六苏联作家出版社刊行的“在悬崖边上”一书译出的。其余的“一天”等三篇是从一九五四年第七期英文版“苏联文学”转译的。

特罗耶波尔斯基的作品的特点是幽默和讽刺，作者用“笑”无情地揭露了生活中一切丑恶的地方，随着“笑”而来的就是对自私、虚伪和不关心人的种种现象的憎恨。在作者的另一些作品里，则用很高的热情与尊敬歌颂了那些纯朴、正直、勤劳的平凡的劳动者。我们可以从作者的所有作品中嗅到浓厚的生活气息，这是他多年来深入了解生活的结果，也是作品的成功之处。

作家出版社编辑部

## 目 次

米特里奇	1
在悬崖边上	56
农艺师	103
一天	118
“夸夸谈”尼基弗尔	176
“顺手捞”格利夏	197

## 米特里奇

牆上挂着一支獵槍。

常有这种情形：一瞅見獵槍就会勾起你的回憶。于是，一幕幕的往事在眼前閃現。香蒲湖周圍八月森林里暖和的夜晚，春天的早霞，鋪着金黃树叶地毯的可爱的秋天，或者像青春一样朝气蓬勃、愉快無憂、初雪后陽光普照的冬天，都浮上記憶里來。許許多多的事情都想起了。你走到任何地方，都不是孤独的。在这美丽可愛的故乡的事物中有一個人出現在記憶里。

比如那飞去的灰鶴吧！它們叫人不知为什么想起過去的日子。真想跟它們一塊兒飞去啊！可是你一听见白头翁和百灵鳥的第一声啼啭，哪兒也不願飞去了——你站下来，屏住气息在听，听着故乡辽闊原野的呼吸，听着自己心臟的跳动和又回來的灰鶴的那种叫声。它們回來了！灰鶴唱的歌子也不像秋天的那样悲伤了。不，鳥兒在挨个啼鳴，拖拉机在远方轧轧响，含苞欲放的嫩樹芽和發过水的綠洲上嫩山水楊的可爱的毛苞都在散發着香

气，在这醉人的春天的融汇混杂的声音和气息里，灰鹤的歌子是使人高兴、使人愉快的。这些毛苞多么柔软啊！柔软得像婴儿的耳朵垂一样。

这一切就是生活。

这一切都想起来了。在这一切中间的是人。许多的人，各式各样的人，所以多的原因，是很多年过去了，是愉快的春天，有着独特的美丽而又肃杀的秋天，朝气蓬勃，有时又严峻的冬天来来去去很多次了。可是在很多形形色色的人中间，老是有一人固执地生活在记忆里。

……那次发大水时候的一个春天的夜晚，我记得挺清楚。

那天晚上，我喂了喂野鸭<sup>①</sup>，便离开了小船，这时候，差不多天已经黑了，我在发过大水的河岸上燃起篝火。春天的黄昏不知怎么仿佛一下子就降临了：本来你可以瞅得很远很远，可是你稍微耽搁一会儿，沉思一下，——二十分钟以后，连旁边的小橡树都看不大清楚了。于是，这里剩下一片隐隐约约的轮廓：树林的边缘，胡桃树丛，田坎上孤零零的飞帘<sup>②</sup>——一切都变得黑糊糊的，一切都仿佛比白天大些。在这样的夜里，大自然沉浸 in 一种

---

① 这是打獵的人自己帶的野鴨，專門用來引誘別的野鴨以便獵取的。

② 一种野生薊科植物，莖高三、四尺，莖和葉上密生細刺毛，夏天開淡紅色花朵。

宁静、庄严、幸福和巨大的期待里———一切都在等待着遍地绿茵的真正的春天。

不久以前，冬天已经淹没在河水氾濫的洪流里，柳树已吐出幼芽，这幼芽散发着春天的气息，福寿草也在空气里愉快地吐出一股股清香，这一切使一个热爱故乡的人会不由地微笑起来；宁静的、没有一丝微风的春夜，虽然充满了各种音响，但这些音响也是宁静的：一只耗子在附近什么地方吱吱叫着；一只迟来的雄山鶲在林边的上空“嗬一嗬一嗬”的叫出刺耳的尖声；有个看不见的什么东西在灌木叢里跑过去：是只小鼬鼠，还是一只黄鼠狼———就不知道了；水鴨扑搨着翅膀，从远处的島上傳来鵝的交談声，它們在商量着春天的活兒。可是，这一切音响那么輕微，那么柔和，宁静沒有受到破坏，仍然那么可爱。

篝火燃旺了，周圍的一切完全陷入黑暗里，宛如讓黑色的幕給遮盖起来。只有身边的灌木似乎是活的——它们在閃爍的火光里微微顫抖、搖摆。篝火噼噼拍拍地响着，已經使人分辨不出周圍那些細微的音响，但是，在一片漆黑中待在这一小塊光亮的地方是多么舒服啊！

那时候，我听见有个人慢腾腾地、不慌不忙地走近篝火：是个好人，还是个坏人呢———不知道。黑暗里清清楚楚地出現了一个体格魁梧的人的身影。

“这儿有堆小火，”他不知为什么沉思地說道。接着，問起好来：“晚上好！”

“晚上好！”我也回答說。

这个陌生人取下肩上的獵槍和裝着几只公鴨的獵袋，在火堆跟前盤腳坐下；過了一會，他主人式地用棍子撥起火來。他默默地做着這一切，瞧着火，彷彿沒有注意我在旁邊似的。好像他是主人，我是客人，可是實際上，恰恰相反。

“看來，您是到我們這兒打獵來啦？”他用平靜的聲調問。

現在，他瞅着我。顯然：他乍看見我就判定我不是本地人。

“我是外地來的，”我說。“上面派我到李索瓦托葉來作農藝師。後天就開始工作。”

“啊——啊……”這個陌生人含含糊糊地拉長聲音說。  
“那就是到我們這兒來的。我就是李索瓦托葉人。”

後來，他解開綿上衣，從懷裡掏出一個布包，把它打開，由布包里拿出一小塊面包，撒上點鹽就吃起來。吃的時候，他問：

“您從哪兒來的？”

“從舒斯托瓦洛夫來的。”

“你們那邊怎麼樣？”

“哪一方面的事呀？”

“集體農莊呀。都加入農莊了嗎？”

“都加入集體農莊啦。”

“可是我們這兒沒有都加入集體農莊；有兩個不干——離開村莊，搬到城里去了。”

他又沉默起來，不吃了，想着心事；後來嘆了口氣，又好像因為自己嘆了氣而不好意思似的，瞅了我一眼。總有點什麼事情使我這個談話的對方苦惱着。於是，我決定把这个中斷的談話繼續下去。

“您入集體農莊了嗎？”我問。

“昨天把馬牽去了……”他嘆了口氣說，已經沒有什麼不好意思了。“牽去了……”沉默了一下，他又加了一句說：“一匹怀孕的母馬……”

“這麼說，捨不得嗎？”

“可不是嘛……想得很多啊。”他把面包放在膝上，搔了搔耳朵後邊，把帶耳朵的帽子往前邊鬢角上稍微推一推，繼續說：“這也是個習慣。買的時候還是個馬騎子，養大了，用它干活……現在，把它牽去了。完全牽去了。沒有馬了。”

他絕望地揮了揮手，拿起那一小塊面包又嚼起來。他左手掌上鋪着一塊破布，右手拿着一小塊面包；咬面包的時候，他朝破布微微弯下身子，把面包渣兒聚在一起，他做的這一切動作，跟孩子們吃甜點心時候作的動作一樣。他吃着，也不吭氣。

我也吃着，時時瞅瞅我談話的對方。從外表上看，他很安詳，不慌不忙的。他那不大不小的寬寬的鼻子，不多

的、可是稠密的鬍子跟他那强壮有力的双肩非常相称。他的兩眼藏在濃密的、皺起的眉毛下边，叫人看不清楚；看起来，这个人似乎很严厉，大約有五十五岁。

“很早就买了那匹馬嗎？”我問。

“一九二六年。”他說。“买的时候是个馬駒子。現在，已經四岁了。”

“在这以前有馬嗎？”

“沒有。有了苏維埃政权，才攢了点錢，有了苏維埃政权，也……才活下来。”

我們同时吃完。我剩下一块面包，就照老習慣把它扔到离我不远的地方。可是我的談話的对方却把破布上的面包渣兒抖到手掌上，送到嘴里，並且不和善地說：

“我这样想：合作化是搞不好的。”

“这是为什么呢？”我問。

“瞧瞧，你把一块面包給扔了，面包渣兒……也应当愛惜啊。我打扫打谷場的时候，像这样一块面包我都還要撿起来的。可是你却把它扔了。”

他突然叫起“你”<sup>①</sup>字，因此，我明白我失去了他对我

的尊重。

“得啦，一点面包渣兒算不得什么儉省，”我企圖辯解。

<sup>①</sup> 俄羅斯人对生人或对人客气的时候，称对方为“您”，对熟人或对人不客气的时候，称对方为“你”。

“俗語說：‘積少成多’，你聽說過吧？”

我沒有什麼話反駁了。於是，我只好說：

“是的，聽說過。”

“是呀。在集體農莊里就會發生這種情形：這個人一粒一粒地撿，那個人成塊成塊地扔。”他稍微沉默了一下，就接着說：“比如再來談談勞動日吧……這是怎麼回事呢？”

“嗯，先把干的活登記下來，以後再分配——看誰掙多少分。”

“好得很哪！”他微微冷笑了笑。“好得很哪！干了一年活，才……那不成，你得每天給我一張收條：上面說明干了一天活兒。還要蓋上圖章。”

我沒有跟他爭論，因為，是登分呢或是給一張蓋章的收條呢，這兩個辦法哪一個好，連我自己也弄不清楚。至于勞動登記簿我們當時連想都沒有想到呢。

“比如說，連馬……伊留哈·柯佐多伊昨天就用我的馬干活兒來着，把馬趕回來的時候，馬渾身是汗。哼，這是怎麼回事呀？”也不知道他是問自己呢，還是問一個不在場的人，不過這個問題似乎跟我毫不相干：他簡直認為我是一個外行，把我當成剛離開學校的毛頭小伙子。可是我却直截了當地問：

“您不相信集體農莊嗎？”

他注視着我，思索了一下，過一會，他用和剛才不同

的、十分柔和的声調回答說：

“跟你怎麼說呢？不是不相信，而是……懷疑。”他低下头沉思起來。“這是一輩子的事啊。結果怎樣——却不知道。我懷疑。”

他這樣低着頭坐了一會兒，突然說：

“要走了。”

“回家去嗎？”

“回家去。”

“不想留到早上嗎？”

“够了，已經打了四只了。”

于是，他不慌不忙地收拾起來，裹了裏包腳布，說：

“再見！”

“您叫什麼呢？不然，這樣坐了一晚上，連……”

“叫米特里奇，”他已經邁開步子，回答說。

“再見！”

他那有點微駝的脊背慢慢地隱沒在黑暗里。

一只鶴在很遠的什麼地方嘎嘎叫着。篝火漸漸熄滅。星兒更加明亮，銀河像一座莊嚴的橋架在世界上。我耳朵里還響着：“我懷疑……不是不相信，而是懷疑……”就在這個時候，我強烈地、真正地感覺出來：一件新的、巨大的事情開始了，為培養新人而進行的鬥爭開始了。雖然我當時還年輕，可是已經感覺出來。

我撥開殘余的篝火，用枯樹枝把那個地方打扫了一

下，鋪上去年的干草，便躺下睡了。但是睡不着。这次和米特里奇認識，在心里留下一种不舒服的感觉，但究竟是怎么回事——却一下子想不起来。我忽然明白了！于是爬起来，划着火柴，找到我剛才扔掉的那塊面包，把它周围吹了吹，放到袋子里。

当时我是二十五岁。

李索瓦托叶的“霞光”集体农庄在我的农艺区里，我就搬到那兒去了。

有一次，我和李索瓦托叶村苏維埃主席苏奇科夫見面的时候，問他：

“維克多·菲拉吉也維奇！您覺得米特里奇这个人怎么样？”

“科尔松科夫嗎？”

“是的。”

“华西里·米特里奇。啊一啊，怎么回事？”他又問了一次，似乎怀疑地瞅了我一眼。

“一个熟人。”

“您的米特里奇純粹是个反革命。”于是，他毫不掩飾他的憎惡，从头到脚仔仔細細把我打量了一番。他把寬大的便帽推到后腦勺上，兩只手插在窄皮帶里，並說明道：“什么措施他都反对。”

“是个富农嗎？”

“如果是个富农，那就把他清算啦。別跟他接近。他

是个反革命。”

“請您說的詳細一点，”我要求說。

“年輕人，过一个时期或許你就会看出来的。跟他来往沒有好处。‘一个熟人！’”他冷笑了一下，嘴撇到一边去了。

从主席的这种官腔上和那諷刺的微笑上，可以很容易地感覺出来：他对米特里奇的憎惡，在某种程度上也轉移到我身上来了。苏奇科夫走了，連再見都沒有說一声。

这次談話以后，过了大約兩星期，我和集体农庄主席瑪赫罗夫斯基·伊凡·斯杰潘諾維奇坐車巡視田地，瞧見这样一幅情景：十多匹拖着耙的馬站在村外，离一台拖拉机沒有多远。馬的旁边沒有一个人。拖拉机跟前却聚集了一大羣集体农庄庄員，这些庄員不久以前还是个体农民哩。这羣人里面也有米特里奇，他們爭吵得很厉害。我們听到米特里奇的声音：

“那你就下来，滾他媽的蛋！”

“你說什么——下来？”拖拉机手在座位上叫道。“又不是你叫我来开拖拉机的！”

我們來到这里，下了旅行馬車。爭吵立刻停止了。

“怎么回事呀？”伊凡·斯杰潘諾維奇問。

沒有一个人回答。

“为什么不干活呢？”伊凡·斯杰潘諾維奇又問了一句。

米特里奇說話了：

“要是这样干活，倒不如不干。这是什么玩艺？”他指着播种机問。“这个播种，而那个破坏。你們这样來害我們。”

这时候，村苏維埃主席苏奇科夫恰巧也騎馬來到了。他沒有下馬，就叫起來：

“又在反对！又是不高兴！”

“又是不高兴，”米特里奇憂郁地答道，他把臉扭到一邊去了，瞅着远方的田地。

“你埋怨他干什么？”苏奇科夫对伊凡·斯杰潘諾維奇說。“你把他从集体农庄赶出去得啦！”

伊凡·斯杰潘諾維奇什么也沒有回答。他和我一塊兒仔細看了看和拖拉机配在一起播种的兩台馬拉播种机。他像平常一样安詳，不輕易說話，用兩個手指头捏着亞麻色的短鬍子，想着心事。后来，他瞅了瞅我，微微皺起眉头，仿佛在問：“嗯，新来的农艺师，你看怎么办？”

“应当試一試，”我迎着他的目光，對他說。

“好吧，我們來試試。开动吧，”他对拖拉机手說。

拖拉机手开动了拖拉机，慢慢地走着。我們跟在播种机后面。一台播种机上的播种器一会儿播得很好，一会儿忽然响起来，把播种机震得直搖晃，种籽就播不下来了。結果，就产生了看不出来的漏种地，这些漏种地只有在麦子發芽以后才能發現。我們讓联动机停住，回头瞧